

CISAP 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

日本对华战争 指导史

[日] 堀场一雄 ◎ 著
王培岚 等 ◎ 译

海外
译丛

世界知识出版社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

〔日〕堀场一雄 / 著

王培岚 等 /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 (日) 堀场一雄著 ; 王培岚等译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16.1

ISBN 978-7-5012-5125-4

I . ①日… II . ①堀…②王 III . ①侵华战争—史料—
日本 IV . ①K265.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6637 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陈可望
小 月

书 名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

Riben Duihuazhanzheng Zhidaoshi

作 者
译 者

[日] 堀场一雄
王培岚 等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ishizhi.cn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新华书店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 × 1000毫米 1/16 33½印张
600千字
2017年10月第一版 201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5125-4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编：梁守德 王缉思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铁军	王缉思	王校轩	刘 华	李 晨
张 炜	张海滨	范士明	唐士其	袁路明
梁守德	徐弃郁	梅 然	寒天阳	董子峰
温金蓉	欧阳维			

丛书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古代兵圣孙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写下了这段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与战略研究是世界军事与战略研究中的璀璨明珠。现代军事战略发端于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在国际史学界，19世纪中叶以来的军事与战争史被定义为近现代军事史和战争史。近现代军事史与战争史与现实距离最近，其所能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对于现实，而且将会对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近现代的军事与战争实践经验是丰富的，也诞生了毛泽东等战略大师，其“人民战争”与“游击战”理论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中国国界。

同时，中国的现代战争与战略研究，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战争与战略研究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并且相对缺乏机械化、海战和空战等现代战争经验。与古代战争和战略研究一脉相承的是，军事史与战争史是现代战略研究最重要的学科基础。拿破仑战争的实践催生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通过梳理近现代的海战史，马汉总结出“海权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又推动各国战略理论家对于“空权”“间接战略”“坦克战”“大纵深战役”等问题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因为投入相对有限，中国学界对于近现代战争史的研究，虽然通过军内和地方学者的努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战史、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和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还是缺乏深度和广度，不仅中国自身的战争经验尚未得到深刻的总结和有效的利用，而且对于自身所缺乏的国外战争经验的借鉴也相当有限。

国外现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研究领域的优势，主要源于其对于军事与战争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军民融合与综合研究的传统。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的1909年，牛津大学就已经设立了战争史讲席教授。首任讲席教授斯宾

塞·维金森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既然牛津大学的学生是未来的治国人才，那就有必要让他们了解和掌握军事和战略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一种途径，就是开展对于军事史，尤其是近现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教学。除了学界，国外军界对于地方学者参与军事历史研究一直十分支持。在19世纪末期，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就聘请多名海军史学家前往任教，英国海军史学家和海军战略家科贝特甚至参与了一战前英国海军对德作战计划的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美国军方也邀请了诸多历史学家参与了其官方战史、情报史的编撰，以及很多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的研究课题。除了军界和学界的努力之外，发达国家很多民间的研究者，凭着兴趣与热情，利用开放的历史档案，撰写了大量高水平的军事历史著作，不仅填补了很多研究空白，而且增进了公众对于军事历史的真实了解。因此，国外军事史研究呈现出军界、学界与民间共同携手，宏观、中层、微观研究与普及教育打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为军事战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自古知兵非好战”。要想更好地维持和平，必须更深入地研究战争与战略。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立足北京大学这一综合性大学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旨在以军民融合的方式，通过坚持不懈地推进军事史和战争史研究，为中国的战争与战略研究夯实基础。为此，我们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希望凭借这一平台在两个方面聊尽绵薄之力：一是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军事史以及战争与战略研究的优秀成果，二是努力推介国内学界对于近现代中外战争与战略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期盼学术界同行、同好共襄此举。需要指出的是，本丛书选择译著与论著的依据是其在战争与战略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学术参考价值，并不表示编委会和出版社赞成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

最后，衷心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以及丛书的作者和译者对于我们的鼎力支持。

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3年10月

2017年中文版

编者的话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中文版《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

该书可称为本社已出版的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的姊妹篇，记述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作者是旧日军的精英官僚、陆军大佐堀场一雄。他1900年出生，1914年入日本名古屋陆军少年学校学习，1922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第34期），1930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他始终在策划侵华战争的核心机要部门担任要职：1937—1939年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处工作，1939年12月—1941年7月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工作。在参谋本部和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文件中，他拟制的方案甚多。堀场一雄说：“我的全部精力完全贯注于处理对华战争。”

战争结束后，堀场一雄撰写了《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原名为《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一书，经过日军防卫研修所战史研究室编辑加工，于1962年由日本时事通信社出版发行。

从内容来看，作者从日本旧军人的立场、观点出发，系统地叙述了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介绍了战争各阶段、各次作战的形势、双方态势、战争指导方针、作战原则，并详细地阐述了日本当局勾结中国顽固派、收买投降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战略、策略。由于作者在日军机密要害部门工作，在书中使用了不少从未发表过的绝密、机密、秘密资料。

书中使用的“中央”系指日本最高当局，即政府、总参谋部、大本营，书中使用的现地、总军系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书中引用的国名、地名、事件名称按原文翻译。书中的注释和附记都是作者加的，注释是关于具体问

题的说明、方针政策的解释和观察分析；附记是除正文以外作者个人的观点和附带的事项。原著还附有一册《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统计资料》及作战经过概要等图表六枚，中文版从略。

我们决定出版该书，主要是出于这部著作在战争与战略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史料和学术参考价值的考虑。编者和出版社当然不赞成作者从日本旧军人角度出发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和立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该书对于我们了解日本过去那段军国主义的历史和当前日本一部分人的历史观，都会有所帮助，相信读者自会明察。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出版使用的是1988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王培岚等的译稿。本次编校过程中进一步核查了相关历史，纠正了作者、译者和1988年军事科学出版社《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中的一些错误与疏漏，正文和图表制作也力求精良。但由于本书篇幅较大，难免仍存疏漏，敬请指正。

本次出版，编者经数年多方查询，仍无法联系到译者王培岚先生等。敬请译者们看到本书后，能够与编者联系。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世界知识出版社（邮编：100010）；联系人：李思进；电话：010-65265961；电子邮箱：36627505@qq.com。

对于各方给予的出版协助，编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7年9月

目 录

第1章 对华战争指导概观	1
战争的本质	1
战争爆发的原因	2
战争指导概要	3
战争指导的主体	5
战争阶段划分	6
第2章 战前形势	7
欧美形势	7
东亚形势	8
“日满华”关系	12
日本国力建设	19
第3章 战争初期 (1937 年 7 月—11 月)	34
卢沟桥事变	34
诉诸武力的决定	40
扩大为华北事变	45
扩大为全面对华战争	49
一举取胜方案的破灭	52
第4章 南京作战前后 (1937 年 11 月—1938 年 1 月)	54
攻占南京	54
解决战事所做的努力	56
和与战的争论	63

政权问题	71
华北、华南战局	77
第5章 徐州作战前后 (1938年1月—6月)	79
持久作战的战争指导方案	79
新军制方案	85
国内体制的整顿	91
徐州作战	94
第6章 汉口作战前后 (1938年6月—11月)	98
汉口作战准备	98
对战争认识的启蒙	100
战争指导方针	108
战争目的的阐明	116
形势的发展	121
攻占汉口、广州	127
第7章 转入战略持久 (1938年11月—1939年3月)	130
今后的战争指导	130
调整方针的执行	141
转入持久作战	148
第8章 政略的推进 (1939年4月—8月)	159
新中央政府问题	159
对德意合作的加强	179
对英美法的斗争	182
日苏纠纷	189
第9章 促进战争的解决 (1939年9月—11月)	192
形势的变化	192
重新研究战争处理对策	196
最高指导	202

第10章 调整日华关系的协商内容 (1939年12月)	211
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	212
秘密谅解事项	214
机密谅解事项	224
向中央转达的谅解事项	226
第11章 促进汪蒋合流的活动 (1939年12月—1940年3月)	229
现地处理方案	229
青岛会谈	234
汪蒋合流工作	239
新中央政府成立	249
内外形势	254
第12章 汪蒋合流后的活动 (1940年4月—9月)	259
处理方案	259
对重庆的工作	270
现地指导	281
形势的新发展	294
第13章 转入持久作战 (1940年10月—1941年2月)	307
持久作战的方针	307
日华新条约	328
第一阶段政略指导	347
中央关于持久作战的方案	355
形势的复杂化	368
第14章 持久作战方略的推进 (1941年2月—7月)	377
现地建设的促进	377
措施上的矛盾	390
作战方略的实行	398
内外形势的剧变	414

第15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1941年8月—1942年5月)	428
日美和战谈判的经过	428
武力进攻的准备	438
对华战争的处理	441
一般形势	445
对占领地统治和建设问题的研究	447
第16章 太平洋战争中期 (1942年6月—1943年12月)	451
对华战局	451
对华新政策	454
一般形势	470
第17章 太平洋战争后期 (1944年1月—1945年8月)	475
对华战局的变化	475
一般形势	480
战争结束	491
第18章 对华战争概观	497
历史阶段的回顾	497
对民族生命的反省	497
明治日本衰老的症状	498
从大局着眼的道义主张的没落	499
对华战争的始终	500
对华战争的可分性	501
忽略了长远大计	502
缺乏杰出的人才	502
第19章 战争指导上的反省	504
战争指导力的缺陷	504
缺乏综合统一	505
方针缺乏一贯性	506
轻率地定下没有把握的决心	507
对战争认识不足	508

战争目的的坚持	509
进军界限的规整	510
结束战争的努力	511
国策的决定过于迟缓	512
作战的专行与先行	512
自力自主的必要	513
指挥、决策的微妙	514
错误的重复	514

第20章 对时代趋势的观察	516
陆海军的对立	516
军内的情形	516
对军方真意的妄加论断	518
国民理性的趋向	519
太平洋战争的性质	520
大义责任的归趋	521

第1章

对华战争指导概观

战争的本质

对华战争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乃民族生存和国家存在所不可少的条件。对华战争的历史意义，正如当时战争指导当局所说的，消极地讲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编者注）终止之战；积极地讲是重建东亚的序幕之战。现在，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对华战争的这些内容，都已同满洲事变一起化为乌有，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存在也因此遭到了破坏，实在可惜。

满洲事变，虽通过1933年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在形式上告一段落，但事实上则错过了结束事变的时机而延续到1937年。因此，究竟以何种形式解决满洲问题，是解决对华战争的重要课题。这就是所以称之为结束满洲事变之战的缘故。

随着世界东西方文化的历史消长和近代欧美各国对东亚的入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关税斗争乃至集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东洋的觉醒，使之面临着重建东亚的迫切任务。改善“日满华”关系乃至实行联合，是重建东亚的基础，而改善和联合到什么程度，则成了当时的根本课题。这既是对华战争的原因，又是处理战争的方向。中国问题的特点是，近百年来，它同各国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处理战争应在不致引起同这些国家的纠纷的限度内，与之协商解决。这就是所以称之为重建东亚之序幕战的缘故。

从另外角度看，满洲事变和对华战争，是成长发展中的日本同疯狂进行国内统一的中国，缺乏相互理解和同情、缺乏指导上的调和态度而导致的悲剧。满洲事变始终没有结束。对华战争失败了。能说满洲事变是前三年的任务，对华战争是后五年的任务吗？原来处理中国问题的界限，本应约束在避免列强干涉的限度之内，但因大势所趋，不但突破了这一铁的界限原则，而

且以世界列强为敌卷入了太平洋战争，甚至提出了解放东亚的口号。从此，就超出了序幕战的范围，改变了对华战争的本来性质，并且导致了失败。

〔注〕一般地说，东亚及其周围地区，可以自然划分为日朝“满”、中国本土、南洋、澳洲、印度及北部寒冷地区等6个地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特别是日本同中国大陆之间，除有着民族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联系以外，在关系国家存在的国防、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着密切的依赖关系。

从最显著的经济关系看，日本全部进口为39.5亿日元，从中国大陆进口达5.5亿日元；全部出口为33.2亿日元，向中国大陆出口达9亿日元。再看附近地区的南方，从那里的进口，近处只有4亿，远处（印度、澳洲）只有6亿。在品种方面，以煤、铁矿石为主的炼铁原料；以非铁金属、硫安为主的若干化学制品材料；以大豆、玉米、高粱为主的杂粮食品，盐及麻类原料等，离开大陆而从南方及其他地区间接进口都有许多困难。向南方的出口，近处只有4.5亿日元，远处只有4亿日元。在品种方面，向大陆出口的机械，药品、染料（砂糖）、陶瓷器、罐头食品等，如向南方及其他地区间接出口，也有困难。特别是出口大宗的纤维制品，如果失去大陆市场，即会产生相当数量的过剩。

战争爆发的原因

对华战争爆发的原因，可以大体分为两个：中国的特殊情况，近来的国际形势和历史性的变动等为一般原因；满洲事变，华北内蒙问题和中国共产党进入华北等为直接原因。首先看看一般原因，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它尚未达到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程度，中央政令得不到充分贯彻而某些问题需要由地方政权进行处理。社会秩序不安定，军队不统一，采取现地保护和自卫等措施往往是常事。因此，对中国来说，努力完成一个现代统一的国家，就成了国内最大的政治目标。加之，随着人民的觉悟，对于近代各国在历史上所进行的侵略，产生了强烈的恢复国权乃至排外的思想，这种思想，为大规模统一国家的政策，提供了可能。而国际形势呢，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展开了关税斗争，英美苏等国都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基础，开始建立起集团经济，并各自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思想和政治渗透。反过来再看一下历史的进程，近代欧美列强侵略东亚及继而实行文化渗透的结果，终于威胁到了东亚的存在，促进了东洋的觉醒，从而产生了重建

东亚的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于是就产生了包括满洲问题在内的日本问题，亦即所谓“日满华”联合和合作的问题。再看看直接原因，满洲事变未掌握好圆满结束的时机，时间一久，中国的排外思想就变成了排日思想。此间，日本方面积极向华北、内蒙扩张的政策，遭到中国方面统一全国政策的抵制，失去了结束满洲问题的希望，蕴藏了产生新纠纷的祸根。另一方面，进到华北的中共，为了回避国民政府的武力讨伐和积蓄自己的力量，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意识而积极地促进了日华纠纷。

战争指导概要

卢沟桥事变引起纠纷，形势的发展已无就地解决希望，不得已而出兵，战争指导当局举起了“道义战争，从道义上加以解决”的大旗。可是，鉴于历史和国际形势，加上东洋的觉醒引起了复兴东亚的念头，而作为东亚的中心存在，即“日满华”的睦邻联合又被看作是万事之基础，因此，就需要消除过去的一切矛盾，把东洋道义作为三国联合的根本观念，重新使道义复兴，进行道义的建设。然而，有的舆论则不解其意，甚至有一部分人对此还进行冷嘲热骂。

战争指导的要诀是，确立战争目的，规定进军极限和把握停战方针。

关于战争目的的根本观念，如上所述，这一点曾作为对华战争期间的最高方针，并且由于战争指导当局以及总军当局的努力，基本上是始终加以坚持的。具体表现在：在华北作战初期，曾提出以改善华北特别是满华接壤地区为主的消极解决方案；随着战局的发展，经过上海附近的会战，发展到南京作战时，又确定了关于以华北有关问题为主的就日华全面关系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但是，政府在采纳本案时，是有不当之处的。战争指导当局，根据以后形势的发展，又把战争目的透彻而明确地规定为旨在实现“日满华”道义联合的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大原则，作为尔后坚定不移的方针，以防止受战局迷惑而增大欲望的倾向。本案成了尔后处理战争的依据，随着汉口作战的进展，被定为国策，所谓近卫声明也是采纳了本案的。经过许多曲折，汪精卫逃亡出来，缔结了日华基本条约。这样一来，本来可以自觉地按一贯的路线贯彻战争目的，但在作决定时，还总是欲望过大的人占居多数；在对一旦决定的事项进行具体讨论或执行时，也还是一再产生过大的奢望，出现追求大量战果和牺牲代价的狂态。其情形无异于西洋式的侵略

者。结果远远离开了道义的建设性战争的道路，在目的和实践之间也往往包藏着矛盾。为确定和坚持战争目的，需要始终一贯地保持绝大的努力。但随着尔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纯粹的对华战争目的即发生动摇并终于起了变化。

关于进军极限问题，在战争指导和作战指导上常缺乏统一。在用兵限度方面，除汉口作战后战线停止推进，总是对大局估计过于不足。特别是在对华战争初期和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作战大都是独断专行并且轻举妄动。具体讲，战争指导当局提出的方案是，事变当初绝对不可出兵，若不得已而出兵，可使用全军的约半数（15个师），一举推进到黄河以北实施作战，在短期内结束。但执行这一方案时，却决定仅仅使用3个师在平津地区作战，按保守盲动的决心出兵，形成逐次使用兵力，造成了长期战争的局面。上海附近地区的作战一开始，战争指导当局就提出以南京为战略目标一举解决方案；战线接近南京时，为了把握解决时机，又主张把军队停在城外，按兵不动。而作战当局，却置之不顾，乘势攻占了南京。其次，战争指导当局强调，对徐州开战要慎重从事，但由于大势所趋未阻止住。作战指导先行于战争指导，现地作战先于中央作战指导。恰如富有攻击精神的尖兵队长在引导全军逐次扩大战局一般。汉口作战时，战争指导当局，根据各种形势，认为需要积蓄国力，为了阻止战线向南扩大，曾大声疾呼：“国家存亡的界限在长江一线”，当时，勉强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达到了目的。此间，只有广州的战局，有严格的节制。进军极限，应从战争指导上的大局着眼作出规定。但是，一般由于作战第一的思想作怪，以及作战指导者对大局缺乏明确认识，所以，作战指导常常离开战争指导，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轻举妄动。然而，就在上面所说的战线停止推进，尔后陷于胶着状态，需要转而进行持久作战指导时，用兵决心也未能与之相适应。事态反而向其他方面发展，超出国力的界限，投入了太平洋战争。

关于结束战争问题，战争指导当局和总军当局曾不断努力推行解决方案，但几次都未能实现，终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具体讲，战争指导当局，在事变一开始即力求就地解决，避免惹起大事，但因大势所趋，未达成目的。在进行南京作战时，在努力通过陶德曼交涉解决已有大半成功希望，因作战当局独断专行和国内的战胜感等弊害，可惜错过了机会。为了纠正当时那个“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府声明，战争指导当局尔后作了约一年的努力。其后，在汉口作战中发表近卫声明前后所作的努力，尽管有一半奏效，结果使汪精卫逃亡出来，但重庆却仍抱怀疑态度而未做出决定。在南京政府成立前后，以总军当局为中心，曾反复努力在政略上加以解决，因时机不够成熟，